

樊安群 著

中国经济 转轨阶段论

兼论GDP的科学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经济转轨阶段论

兼论GDP的科学发展观

樊安群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济转轨阶段论：兼论 GDP 的科学发展观/樊安群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9
ISBN 7-5004-5231-4

I. 经... II. 樊... III.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IV.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754 号

责任编辑 丁玉灵
责任校对 尹力
封面设计 王华
版式设计 戴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0(邮购)	010—64031534(总编室)
网址	http://www.csspw.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盛华印刷厂	装订 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10.625	插页 2
字数	280 千字	
定价	2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自序

一般而言，书稿杀青，皆有请名家作序之惯例，以求壮行色，扩大影响。笔者亦是俗人，难免入俗套，自认为成书不易，便动了请大师级人物写序之念；因为书稿内容属于发展经济学范围，思忖再三，便冒昧给该领域的大师张培刚教授写信并寄去了书稿，求其序宝。从内心而言，我对此并没有抱多大希望，一则张老已经 90 高龄，审阅 20 余万字的实属不易；再者张老乃学界泰斗，而自己并非学界有成就之后生，故自忖泥牛入海的可能性甚大。出乎意料的是，信与书稿寄出去一个多月，张老的夫人谭慧女士代为复信，言及张老已审阅了书稿并肯定其现实意义。对不能为之作序说明原因。即从上个世纪 90 年代开始，张老不再写序言、书评和推荐函，张老一向提倡自己写的书，自己写序言，既有感情又有内容，不必迷信某某学者写序……看了谭慧女士的复信，本人不禁汗颜，又如醍醐贯顶，便自激自勉自书其序。

一

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摒弃自我封闭的僵化状态，主动去适应世界经济的行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在世界产业重组的选择中不断调整自己产业结构的问题。由于

中国国情本身的特殊性加上三十多年旧模式形成的惯性，首先就遇到了模式转换的特殊困难。这是本书立论的背景。

从工业化的过程来看，有两种工业化模式：一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流的市场化为基础的主导产业梯次转移模式；另一种是苏联为代表的以计划为核心的优先重工业化模式。西方主流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近两个世纪，就其内部产业演变顺序而言，大致要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消费品工业（食品加工、纺织、烟草等）优先发展，并在工业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加速发展，消费品工业发展速度趋缓，但后者尚不足以代替前者而成为主导产业；第三阶段，以二者达到平衡为开端，资本品工业逐渐取代消费品工业而占据优势地位。这三个阶段的演化代表了工业化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著名的“霍夫曼定理”。工业化的历史实践表明，任何违背这一规律的工业化选择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且注定要改弦更张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劣势，首先在于其工业化模式违背经济发展自身的规律，逆“霍夫曼定理”。中国经济的改革，实际上是以国际化为特征的顺应“霍夫曼定理”的过程，也就是重新达到霍夫曼平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在不同的时期主导产业优先发展（表现为增长速度）和梯次转移是必然的，而其形成的一系列矛盾皆有其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对在“霍夫曼平衡”基本达到之前对各经济转轨阶段予以高度关注。需要指出的是，在“霍夫曼平衡”基本达到之前，转轨经济还没有形成基本平衡的结构，缺乏高速且稳定增长的机制，其增长速度不论多高，都只具有“霍夫曼反弹”的性质，其引发的诸多矛盾都是主导产业转换中的矛盾，只要主导产业选择正确，矛盾皆易于解决且无碍大局。这也是宏观调控应遵循的指导思想。在霍夫曼平衡基本达到之初，经济自身就有了高速、稳定增长的结构条件。但是这一条件并不充分，因

为这一条件既要受到传统模式的惯性制约，也要受到中国几千年小农观念的影响；前者如国有经济的市场化困难等，后者如长期对基础设施的忽视利城市化的无序。这种不充分，决定了经济结构自身的缺陷，从而可能产生局部的结构性不平衡。国家宏观调控在力度和方法上对此要详加考察，尤其注意区分在达到“霍夫曼平衡”前后两者性质的差别，使经济起飞顺利进行下去。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之前走的是一条非城市化的工业化之路。改革开放以后，对于非城市化的工业化造成的错综复杂的矛盾系统，逐渐有了理性的认识和相应的解决措施，这是可喜的；应该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市场环境的恶化。根据形势分析，这种恶化的环境具有经济政治的双重必然性，资源争夺与市场挤压只是其表现形式而已。为了保证中国经济起飞顺利进行下去，国家有必要调整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关系，以聚富于民的长期扩大国内需求为主，在坚持自由贸易和WTO原则下，尽量减少贸易摩擦，增加国际贸易的弹性，使自己处于主动地位，在被动中争取主动。

二

中国的经济起飞及其发展潜力，使美国一些人觉得构成了对美国的挑战，美国不会对此泰然置之，从历史经验来看，美国会在经济方面阻挠中国的迅速发展。在经济方面，其阻挠措施会集中在金融领域，实行汇率博弈。在这一领域美国是有绝对优势的。即便曾是经济优等生的日本，也曾深受《广场协议》和《卢浮宫协议》之害。而日本当时的经济实力与产业结构之平衡性，以及国际经济环境远非今日中国可以相比。日本是先富后货币升值，其外汇来源的贸易顺差是依靠内资企业通过一般贸易途径出口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商品；而中国是未富而货币升值压力大，

中国仅获得少得可怜的加工费。两国相同之处在于二者皆为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同时二者又都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由于日元与人民币不是世界主导货币，从而造成了债权国与债务国的地位颠倒，债务人居于主动地位。加之中国用外汇购买美国国债达2000亿美元之多（占外汇储备1/3），人民币升值既可造成中国出口乏力，减少中国就业岗位，延缓其经济增长速度，使中国社会矛盾集中化和激化；更可以大大缩减美国的巨额债务（美元相对贬值，中国6000亿美元的外汇大缩水）。对美国而言，可谓一箭双雕。现在反思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政策，在金融方面就有三大失误：一是未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基本消退之后，立即对人民币实行贬值，这就形成了人民币升值的空间，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二是在欧元推出后低价位的购买（印度在3年时间内将美元外汇比例由68%降到43%），作为一定比例的外汇储备，以形成多元化的外汇储备格局，减少单一美元储备的战略风险，在金融方面的博弈中有相对主动权。三是购买美国国库券占外汇的比重过大，外汇储备中美元占了82%，2004年降为67%，实际上把外汇汇率的主导权交给了对方，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金融战略的主动权。上述三方面之所以出现，在指导思想上是受计划经济求稳怕乱观念所制约，才造成今天人民币汇率的被动局面。罗伯特·蒙代尔曾指出人民币升值的12个不利因素，这12个因素综合起来，展示了人民币汇率失去主动权的可怕结果。为了长远的金融战略考虑，在被动中争取主动，中国在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调节的自我时机选择外，在资本布局和产业政策的重点上应实现两个转变：一是改变单纯追求外贸依存度为促进内外资的过剩资本向中西部转移，形成国内产业转移的梯度良性循环，加强区域经济合作，发挥中国区域纵深优势，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用规模效益和范围经济造就竞争优势。二是把扩大内

需作为基本国策，坚持内需为本，全国提升国内生活水平与改善生存环境。概括起来就是以坚持内需为本的方针，以国内市场全面形成、升级为主线，以国内区域间资本技术梯度转移为重点，以提高国内生活水平为目标，从基础设施到区域性产业集群，形成有战略潜力的产业滚动发展的强大基础。

三

在书稿初定后，李含林教授、冯明放教授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冯斌先生对书稿之文字、数据进行了仔细校对，避免了诸多错误。对此，表示感谢。感谢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为之提供便利的学院及各系部。

对张培刚先生的鼓励与谭慧女士的回信深表谢意。

在本书写作中，我的家人为之默默付出了许多，在此特致谢意。

2005年5月20日于成都

内容提要

中国经济的转轨自 1978 年以来已有 25 个年头了，其高速发展令世人瞩目，其起伏之大也叹为观止。在这 25 年中，既有两位数的通货膨胀期，也有 3%—4% 的通货紧缩期；但是其共同的特点是始终保持经济增长，也就是增胀和增缩并存。之所以存在以上不完全同于市场经济的现象，其原因在于对转轨经济发展的阶段缺乏科学的分析，在宏观调控手段上，将计划经济时期的金融与财政政策直接套用在转轨经济的发展上，形成了互相矛盾的政策组合，减弱了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由于对增长阶段的性质缺乏深入分析，难免对转轨初中期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缺乏正确理解，对通货膨胀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一旦出现较高的通胀率就采取行政手段予以紧急干涉，造成了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的恶性循环，以致使部分阶段的现实增长率远低于潜在增长率。

本书认为，在转轨经济的发展中：经济增长过程是结构性平衡过程，相应的经济增长属于恢复性和反弹性增长。与此相对应，在市场经济框架形成的过程中，是产业结构从计划特征恢复到市场特征，从严重不平衡逐渐恢复到相对平衡的过程，也是从严重的供不应求过渡到结构性供大于求和供不应求同时存在的过程。不仅如此，转轨增长的前中期货币的快速增长具有必然性，

适度的甚至是“严重”的通货膨胀是经济高速发展的必要条件。中央宏观调控三起三落，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是因为纯粹以传统的紧缩银根政策来抑制通胀量是违反特定增长阶段的经济增长规律的，这种使现实增长率长期低于潜在增长率的措施会对长期的经济发展形成战略性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加速发展的机会，延缓经济增长速度，造成不必要的巨大损失。同时对经济是否已进入了市场经济的起飞时期的判断，将严重影响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经济发展阶段上，把转轨前中期的结构性平衡和反弹性之高增长看成是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起飞阶段的标志，和将市场经济框架形成之后的增长阶段视为次高增长阶段的标志是混淆了两个不同性质之阶段所作出的失误判断。因此，对转轨阶段的分析对上述问题的认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正确分析转轨阶段，提出相应的阶段性特征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符合宏观规律的金融政策、财政政策与产业政策，使转轨经济快速、平稳发展；使产业结构的优化与经济规模形成良性循环。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在经济总量上是否具有科学的发展观的问题。从宏观经济目标而言，其所遵循的目标顺序应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

导 论

一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主题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总趋势是高速增长，但在其中也是一波三折，所谓一波是指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1997年的经济恢复性增长与产业的结构弹性；而三折是指1985年、1988年、1993年至1998年的三次宏观调控。在经历了近四年的紧缩之后，中国经济一开始发动，就达到9%的增长率，这又引起决策层的忧虑，再一次把防止通胀和经济过热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重点指出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与此相适应：中国银行第四次提出了紧缩货币政策（尽管口头上是积极货币政策，但实际上是中性趋于紧缩），并对积极财政政策提出淡出要求。本书认为，所谓科学发展观，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矛盾，重要的是经济增长的性质要与转轨阶段的特点有对应性。应该着眼于四个方面：一是，中国经济的增长阶段的性质如何，其与发达经济体的增长规律有无异同之处；二是，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与现实增长率有多大差距，造成差距的主客观原因何在；三是，今后一个时期乃至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该如何解决？四是作为改革重点之一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与作为开放重点的与第三次世界产业分工重组的协调问题。本书的观点

是：从1978年至1998年的20年中，中国经济的转轨性质及产业结构的内在规律性决定了这一时期的经济超高速增长属于转轨的反弹式的增长，即霍夫曼平衡增长，所以从本质上属于需求拉动型，但在一定区间内存在供给能力制约，是长期压抑的消费饥渴症导致的高增长，在产业结构的变化上有其规律性制约。这一阶段应充分利用资源，大力加强基础设施，为的是给形成市场经济框架后的经济高增长创造基础条件。这一发展特点是绝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所未曾有的。而在转轨国家，尽管方式不同，但反弹式的发展（有的经过长期停滞甚至倒退后再高速发展），高通胀率及产业结构的规律性调整是这一类国家共有的。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高于市场经济国家人均1000美元后的增长率：大约在10%左右^①，而实际增长率只有9%左右。有不少观点认为这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增长率的高线，已经很高了，再高就是过热。而对于通胀率，则认为达到5%以上为较高的通胀率，而达到10%以上就是严重通胀，这是用计划经济和西方市场经济的混合观念来认识转轨通胀问题。实践证明，价格的强烈反弹是转轨经济应有之义，其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温和的甚至较高的通胀率有助于经济本身秩序的恢复。造成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原因是中央政府一定程度的决策失误和控制过严，干涉太多，重点行业的市场化进程太慢。形成政府的失位，错位和越位。以及地方政府急功近利，发展的盲目性浪费了大量资源，导致浪费与短缺

^① 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应为充分就业下的增长率。90年代后期，由于主导产业选择错误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制约，城市与农村的实际的失业率分别达到10%和20%左右，严重降低了经济增长的实际能力。

并存。

从2002年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框架形成以后，无论从人均GDP或产业结构来衡量，中国转轨经济进入了中后期：即进入新型重工业化与高加工度工业化时期，市场经济起飞阶段已经来临。这一时期的潜在增长率，有亚洲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前辙，应该在9%左右；只要政策运用得当，现实增长率完全可以达到。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是基础设施的短缺性及其利用率过低与经济高速增长的矛盾。宏观调控重点已经不是防通胀，而是防通缩，促结构优化型增长。这一时期之初所以出现部分产业过热，部分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幅度大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型重工业化本身的发展对资源的需求。二是对城市化没有真正重视，以致长期忽略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更为严重）的欠账所致。只要处理好选择性进口来平抑物价，就易于解决。这是肘腋之患；心腹之患是中国原材料及能源、水、环境的制约，要保持持续高速增长就必须对投入产出率，能源、水利用率、环境污染等严加控制，节流开源并举。政府要早日用市场规律办法，重点于节流，改变粗放生产方式，强化技术创新，实行集约经济和鼓励提倡循环经济，把国内生产总效益比纳入政府考核体系，才能达到高速增长与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那种认为只要提科学发展观，就要将发展速度降下来，以减少投资，抑制供给，避免对资源与环境形成压力的观点；那种认为实行宏观调控就要抑制发展，一遇到通胀率较高就要“切一刀”，紧急抽紧银根的做法，不免带有几分形而上学的静态特征，并不符合转轨经济的阶段性质。在进入市场经济起飞阶段以后，就要尽一切可能将飞行态势继续下去，在抓好主要矛盾的同时极力避免减速或软着陆之类的措施。应以提高资源利用率为重点，以扩大就业为目标，使投入产出率、资源利用率与经济增长率形成彼此促进的关系；从而在

经济总量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使经济总量与国内生产总效益比呈同向增长曲线，这才是科学的发展观。所以，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目标的顺序应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货币稳定，国际收支平衡。

二 本书的内容结构、特点与方法

本书通过对中国转轨经济阶段的系统研究，进一步分析如何在经济总量问题上，贯彻科学发展观。首先明确转轨阶段确定及经济增长率缺口对经济总量的意义；通过对增长阶段的特征分析，对转轨阶段进行正确划分；从经济起飞阶段的特殊性分析，明确其发展趋势；对转轨以来国家宏观调控手段的得失进行评价；对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矛盾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解决思路；对新一轮产业分工重组的条件下提出重视转轨新阶段的产业政策调整战略的对应性；最后，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经济起飞时期的大致时间段：经济增长率和经济总量预测。

全书共分为八章，重点围绕经济转轨阶段的性质、特点这一专题展开研究。

第一章是转轨阶段的确定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第一节阐述分析经济增长率缺口对 GDP 的意义，通过不同经济增长率（理论或潜在的）与现实增长率的对比，指出 1978—2002 年 GDP 缺口造成的经济总量损失。

第二节通过对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以后高速稳定发展的经验简述，说明在特定发展阶段，保持较长的高速稳定发展的必然性和可能性。

第三节分析 1981 年和 2002 年主要指标曲线，说明经济增长速度要和转轨阶段的性质相一致，在二者一致的基础上，宏观政策要以相应的速度为主要目标，显示出转轨阶段确定对经济增长

率的巨大意义。

第二章中国转轨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及其特征。

首先就国内经济学家对经济转轨阶段划分的经过及特征描述进行简述，特别描述“三阶段”论，及其对二十多年改革开放过程中在阶段论中的性质（起飞性质）。其次对三阶段论的分析，指出经济起飞与三阶段特征的矛盾。最后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三个阶段特征分析，指出不能以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判断经济发展阶段；指出中国经济转轨中的高速增长，属于向市场化基础过渡中的恢复性平衡，与市场经济国家的高速增长的经济起飞期是有较大区别的。重点分析这一阶段的市场化进程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具体情况，指出其区别所在。

第三章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产业结构特点及发展趋势分析。

本章首先对世界主要工业大国产业结构发展规律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八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结构，产业就业结构对照表，归纳出世界经济史上三种产业结构模式（或形式）。然后就中国产业结构及产业就业结构的高级度进行国际比较，提出基本相同的GDP时产业结构高级度与世界诸大国的差别及注意产业结构模式的重要性。在第三节中提出中国产业结构形成与转换的特殊性，并结合中国工业化特点进行分析；随之就中国产业结构转换升级中需要注意的六个问题（中国产业发展模式与当今世界产业结构主流模式的差异、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非同步性、制造业比重与工业结构合理化的差异性、产业结构与产业就业构成升级的紊乱、洛伦茨曲线、基尼系数与恩格尔系数问题及工业化程度的相关分析），提出了经济现阶段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对比表。提出中国现阶段仍处在工业化中期的观点。尤其是提出中国产业结构的模式转换趋势（苏联模式—德英模式—美国模式）与体制惯性的相互作用问题以及发展速度的制约性。

第四章科学发展观与宏观调控的阶段对应性分析

本章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出发，首先对转轨以来三次宏观调控的特点和性质，进行了分析，认为从分阶段的性质来看，三次宏观调控与转轨阶段的特点并不吻合。从一定意义上说，宏观调控之失误在相当程度上造出了“经济周期”，形成了较大的经济波动，并且至2004年对此尚没有深刻认识，以致在2004年的宏观调控中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在具体操作过程中有所偏差，造成了产业发展的短期不平衡。

第五章对转轨各阶段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及效果进行评价。

在第一节中对转轨以来各阶段的金融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作了描述；第二节对转轨以来财政政策作了回顾；第三节对转轨以来各阶段之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性质及协调效果进行评价，提出了理论协调政策与现实协调政策的矛盾，倒逼型政策变型等。

第六章对中国经济起飞阶段主要矛盾进行了分析。

在第一、二节中提出起飞阶段主导产业高速发展与基础设施严重不足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经济增长阶段的非对应性矛盾以及解决主要矛盾的几种思路。第三节中提出以科学发展观去处理经济起飞期的主要矛盾，着重强调以减少国家外汇储备作为基础建设基金。把长江航道的综合整治作为中部崛起的杠杆的指导思想。

第七章分析新一轮世界产业分工重组与中国经济起飞期产业结构调整的对对应关系。

第一节描述世界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其影响，重点在对东亚有代表性国家的影响。指出中日两国由于对世界第一、二次产业分工重组的态度差别造成了两国经济及产业结构的巨大差距；第二节指出中国和韩国在世界第二次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战略选择

中由于主动性的差异导致了两国经济的较大差距。第三节指出在经济起飞期产业结构调整时重点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产业结构模式的选择以及在顺应生产力梯度转移的规律的同时，要注意用适度超前的复合型战略迎承跨国公司的部分高技术转移战略，尽快向“世界工厂”转变。

本书的特点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1) 从经济转轨的特殊性提出“霍夫曼反弹式增长”，区别了一般市场经济的经济起飞的高增长与反弹式增长的高增长。为中国转轨过程中市场框架形成以后的经济起飞后的高增长与一般市场经济的高增长之共性分析作了有力铺垫。

(2) 从中国产业结构形成的特殊性与世界产业结构模式的转换规律的制约相结合的观点提出了转轨时期的产业结构模式转换路径，即苏联模式→德、英模式→美国模式。具体分析了当前经济起飞阶段产业模式正向德英模式过渡，主导产业是第二产业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业结构趋同的时间差异表。

(3) 对转轨以来“经济周期”的性质作了研究，把非典型的经济实际用典型的思维去处理，用计划经济的经典思维去控制经济形势，人为破坏经济周期，把宏观调控变为削峰填谷的手段，造成了更大的经济波动。

(4) 用自然演进与二次赶超的发达国家关于不同经济增长阶段时相对应的基础设施投资重点转移与中国对基础设施的过分忽视造成的严重短缺相比较，对基础设施瓶颈制约经济起飞的事实进行分析，提出经济起飞期主要矛盾的观点。

本书的研究方法注重以下两点：

(1) 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经济增长阶段是一个多因素限定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其中有些因素是不可计量的，而有些因素是可以计量的，为了分析的客观性，就尽可能运用公式、图